

刘建章(1910.3-2008.2),河北省景县人。1926年在北京香山慈幼院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吉林省珲春县、河北省景县县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市民工作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冀南、冀中行署副主任;石家庄铁路局局长;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华北军运司令部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郑州铁路局局长、铁道部车务局局长、新建铁路工程总局局长、运输局局长、副部长、部长、顾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等职。他是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中共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顾问委员会委员。

“文革”中惊动了毛泽东的

刘建章问题

■李春明

“文化大革命”中,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受到批判、揪斗、监禁、刑讯等政治迫害,其妻子刘淑清愤然上书毛泽东,毛泽东知情后,在刘淑清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以此为契机,大批老干部得到解放。

被诬陷为“吕家王朝”的“狗头军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于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强调加快内地建设,集中力量把内地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使之成为我国强有力的战略后方。

为了加快西南地区铁路建设,遵照党中央指示,1964年9月,组建了“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任总指挥;铁道部部长、铁道兵第一政委吕正操,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国家科委副主任彭敏,商业部部长张永励,四川省委副书记熊宇忠任副总指挥。在总指挥部之下设立“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以下简称“西工指”),吕正操兼任指挥长、党委书记,刘建章、郭维城、彭敏兼任副指挥长、党委副书记。“西工指”全面负责工程建设的计划、财务、物资、装备,并对参

加铁路建设的设计、科研、生产、运输、施工等单位实行统一指挥,其办公地点先后设在贵州省安顺市和四川省西昌市。

西南铁路建设的各级指挥机构确定以后,吕正操以铁道部部长、铁道兵第一政委的身份发出指令,要求铁道部、铁道兵抽调精兵强将会战西南,很快聚集起30余万人,形成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的态势。

会战伊始,在“西工指”党委正确领导下,始终强调依靠人的觉悟,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贯彻多快好省、集中力量“先取川黔、次取贵昆、会战成昆”的方针,工程建设取得很大成绩。

1966年“文革”爆发后,江青以“运送红卫兵不力”等为借口公开点了吕正操的名,带头喊出打倒吕正操的口号。造反派夺取了“西工指”的党政财文大权。轰轰烈烈的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被迫处于停顿状态。

此时,主管西南铁路会战的吕正操由于工作关系,大部分时间坐镇北京,并且也在接受批斗,无暇顾及“西工指”发生的事情。作为“西工指”党委第二把手、工地主要负责人的刘建章,便在批斗会上“首当其冲”,成了造反派看得见、揪得到的

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在人身遭受批斗、侮辱的同时,被诬陷为“吕家王朝”狗头军师的刘建章和其他领导同志,政治形象也被恶毒丑化。造反派炮制了“皇帝”吕正操坐在摇着羽毛扇的刘建章与其他几位党委常委抬着的轿子上,后面跟着一长串哈巴狗的漫画,大量铅印,广为散发,流毒全国。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对刘建章等人的批斗也逐渐“升级”。不久,刘建章等几名党委常委即被分别武装看管在“西工指”办公楼附近的平房内,不准看书报,不准听广播,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

这时的刘建章虽然已经得不到外面的任何消息,但仍然惦记着铁路建设,心中十分焦急。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述说此时的心情:“西南铁路建设,关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事,而且工程艰巨,工期紧迫。党中央、毛主席十分重视这条铁路建设,我们是修铁路的,完不成铁路建设任务,是最大的耻辱。至于个人的荣辱安危,我倒没有十分在意,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扭转铁路大会战的混乱局面,使工程建设少受损失。”

1967年7月底,有一封电报发到了“西工指”,内容很简单:速将刘

建章送往北京。收件方为“西南铁道指挥部军事接管组”，发电方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当时军管组的几位成员都返回了北京，深得铁路职工敬重的刘建章在铁路工人的解救下，被护送到成都，随后又被送到成都军区，交给了张国华司令员，被安排住在军区文工团的驻地。这时，成都地区的“武斗”十分厉害，为了保证刘建章的安全，军区又将他转移到成都警备司令部加以保护。

此刻，刘建章的行动已经比较自由，他利用在警备司令部的便利条件，给国务院发了电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西南铁路建设完全瘫痪的情况，请示处理意见。就在等待北京回电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红卫兵”突然将他“揪走”（事后得知是总理办公室安排的），“押”上一架军用飞机送到北京，“拘留”在中关村礼堂旁边的一处平房内。不过这时对他的看管已十分放松，并且允许他与家人通了电话。

妻子刘淑清终于得知了刘建章的下落，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第二天，她便带着部分子女急急忙忙赶到中关村探望刘建章。随后，刘建章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女儿，将他被拘禁在中国科学院的情况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报告，请求给予保护。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得到讯息后，便派联络员将刘建章接到中南海内的国务院宿舍，与王震等中央部委的一些负责同志住在一起，被暂时保护起来。

在中南海，刘建章向余秋里、谷牧反映，“西工指”的负责人彭敏、黎光被造反派揪到各处批斗，下落不明。余秋里立即通知张国华，请他派人设法找到彭敏、黎光。不久，彭、黎二人也被安全护送回到北京。

刘建章由于长时间被拘禁、关押，既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内心感到十分焦虑。待到住进中南海，接触到的一些领导同志，也个个显得心事重重，使他更感疑惑。

自然，他那时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江青的所作所为。只是在那样混乱的形势下，既对改变自己的处境束手无策，又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

不久，李富春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一次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西南铁路建设工程应当尽快复工，并决定派刘建章回“西工指”主持工作。命令发布前让他先回家休息，等候正式通知。就这样，在中南海住了近两个月的刘建章高兴地回到妻子、儿女身边。平安度过了1968年的春节。

在那“血雨腥风”、“人妖颠倒”的年代，两三个月相对安稳的日子，使刘建章处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和兴奋之中，他当时并没有预感到，在这短暂的“安稳”、“平静”之后，更大的磨难正一步步向他和他的家人袭来。

惊动了毛泽东

1968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因为已经得到国务院的通知，刘建章打算过完节就返回西南铁路建设工地，肩负起中央交给他的恢复工程建设的领导重担。然而就在这天深夜，他家突然闯进来几个身着军装的人，以查户口为名直冲到二楼刘建章夫妇的卧室，不由分说给他戴

上手铐，把他塞进了一辆吉普车里就走了。

刘建章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室内除一张单人木板床外，别无它物。他若平躺床上，只要将双臂和双腿伸直，两头都能顶到墙壁。床边没有多少空地，但就在这小得可怜的空间里，他为了活动筋骨，每天坚持练习“形意拳”。“看守”不解地问他在干什么，他自信地回答，锻炼身体，保持体力，出去后好为党、为国家继续工作。

刘建章入狱不久，专案组人员就要他交代所谓“反革命历史问题”。刘建章原本担心这次把他抓来，不知又会给他编造些什么“罪状”，对付起来也许会很麻烦。哪知审查人员拿出来整他的仍然是那些中央已有结论的所谓问题，心里便踏实了。不管专案组人员如何蛮横，他除了做些简单说明外，既不攀扯别人，更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

在秦城监狱的审查中，还有一件事让刘建章觉得“可笑”，专案人员作为罪状要刘建章交代为什么“拉王任重入党”？

当时，王任重也正遭受关押、审查。专案人员问刘建章，王任重是谁发展入党的？你现在要检举、揭发他



1966年，刘建章（穿雨衣者）在西南铁路建设工地冒雨察看新建线路。

的问题，争取戴罪立功。刘建章回答：“他是我发展的。王任重与我同乡，1933年，我在景县任县委书记时，王任重是景县‘乡师’学生运动领袖，他革命意志坚定，思想敏锐，勤奋好学，有较好的理论和文化素养。他是由我介绍入党的首批学生党员之一。一直到40年代初，我们一起在冀南坚持抗日斗争，开辟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他已经成长为我党的高级领导人。至于他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没有办法揭发。”

就这样，刘建章与专案人员日复一日地僵持着、斗争着，因为坚持实事求是，据理争辩，他激怒了专案组人员，被归入“极不老实，态度顽固”之列，专案组对他施加更为严厉的迫害和虐待。

刘建章被关押期间，不仅自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妻子、子女甚至同事都受到株连。他的妻子刘淑清是铁道部机关干部，此时也被关在部机关大楼的地下室里，不准回家，天天被逼迫揭发丈夫的问题。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女儿被下放到山西离石的“五七干校”劳动；在国防科技系统工作的两个儿子，一个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另一个被隔离审查；部队已决定提职的三儿子突然被转业到地方工厂当工人；另一个在农场工作的女儿，已经支部大会讨论同意接收她入党，也被突然宣布取消了入党资格；甚至连高中毕业的女儿申请去北大荒务农，也因“黑帮子女”不宜去边疆而遭到拒绝。

随着时间推移，家人终于得知刘建章被关押在监狱中“监护”审查。“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政治形势的变化促使刘淑清不断向有关方面请求，希望能尽快到狱中探视丈夫。当时的交通部（“文革”中由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而成）部长杨杰，抗日战争时期就与刘建章相识，解放后也曾在一起工作过，互相比较了解，很同情刘建章的遭遇。经过他的努力，1972年6月8日，刘淑清终于获准带领在京

子女，前往秦城监狱探视刘建章。

探视中，刘淑清发现几年未见的丈夫已经面黄肌瘦，双臂不能上举，体质十分虚弱，有时说话也咬字不清。加上狱中条件非常之差，使她触目惊心！刘建章也乘专案人员不注意，将在狱中所受虐待悉数告诉妻子，并伸出手指朝上方指了指，示意必须想办法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

回到家后，丈夫在狱中那凄惨的形象时刻浮现在刘淑清眼前，她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位1934年入党并长期与丈夫并肩进行革命活动的老共产党员，疑惑了，愤怒了！她下定决心，为了丈夫，也为了同丈夫一样遭受迫害的无数老同志，要再次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看到的一切。

此前，刘淑清曾就“刘建章被无辜关押”，通过冀朝铸两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但未见回音。她知道在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想最终解决问题，只有“通天”才行。但同时她也清醒地知道，要把刘建章在狱中所受虐待直接反映给毛主席绝非易事。刘淑清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大女儿在外交部的同事王海容、唐闻生平日一直对老干部遭受迫害十分同情，而且对造反派在运动中的胡作非为十分反感，她们又因为工作关系能够经常见到毛主席，可能是帮自己向毛主席“上书”的最佳人选。于是，她急忙把在干校劳动的大女儿刘润芬叫回北京，商议直接给毛主席写信。

刘润芬回京后，先把母亲的想法告诉了冀朝铸。又将母亲到秦城监狱探视父亲的情况，以及准备给毛主席写信并希望得到协助的想法告诉了王海容、唐闻生。王、唐二人深知，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做这件事需要冒一定风险。但出于对受迫害老同志的同情和正义感，她们表示坚决支持并爽快答应代为转呈信件，同时让刘润芬转告她母亲，要以家属身份反映，狱中情况一定要属实。并说，这不仅仅是刘伯伯一个人的事儿，如果毛主席有批示，就可以解决一大批老同志的问题。

得到王、唐二人的支持，刘淑清受到鼓舞，心中十分兴奋，立即给毛主席写了如下的信：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同志的爱人。

刘建章同志1926年入党，今年62岁。不知何故于1968年2月被拘审查，至今已近5年。最近交通部负责同志曾向冀朝铸同志讲，刘建章同志的历史问题已全部审查清楚，是没有问题的，只待中央最后做结论了。我的全家急切地恳求中央尽快给他问题做出结论。

1972年6月8日，中央专案组通知我们家属准予探视，我们全家非常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但是在探视过程中，我发现他体质很坏，面黄肌瘦，胳膊不能高举，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我对他的身体非常担心，加之监狱生活条件如此之差，每天连饮水也是有定量的（每日3杯），再渴时就只得喝冷水，每天“放风”也只有30分钟时间。有关政治上的大事就更不得而知。像林贼这样大的反党事件，他本人都不知道，而且在中央专案组准予我们探视前也规定不得讲此事。

鉴于上述情况，长此下去，他在今后怎能为党继续工作，同时我还担心他在抗日战争中曾负过重伤（只有一肺）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修建西南三线铁路）时被打坏的腰、肋的身体。1964年还做过一次大手术，割除了胆。

因此，我请求党中央，毛主席在他确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改变目前对他的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他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同时也可借机治病。作为我和我的子女，都坚决拥护中央对他的审查，也完全相信毛主席的一贯审干政策的落实。

此致

敬礼！

刘淑清

1972年7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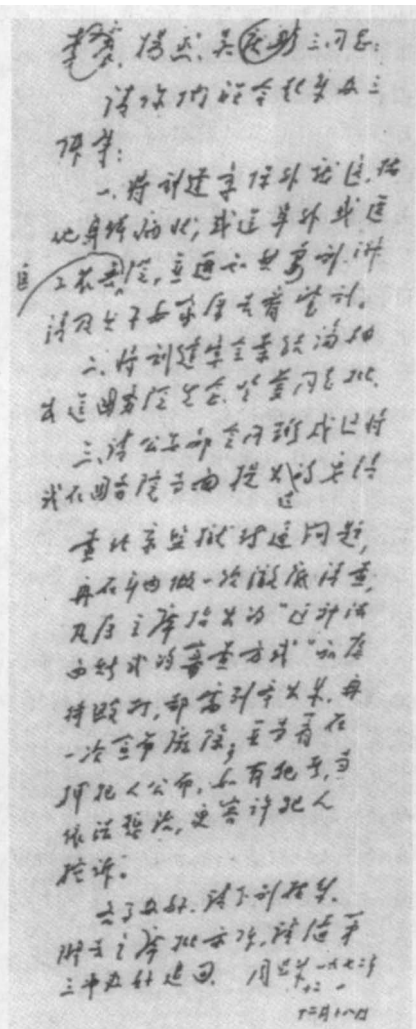
信写好后,刘淑清即请王海容、唐闻生找机会转呈毛主席。毛主席看到信后,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仔细询问,她们将所知道的情况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十分震怒,即在刘淑清的信上作出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周总理得到毛主席的批示,以此为契机,采取多种措施,拯救、保护老干部。他于1972年12月18日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作了如下指示:

李震、杨杰、吴庆彤三同志: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子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周恩来总理为贯彻毛主席批示给有关同志的亲笔指示。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告。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总理的落实安排,像两颗投向“四人帮”的重磅炸弹,是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最有力的打击;也是吹向被关押、被迫害老同志的春风,给了他们生的希望。

1972年底,刘建章终于结束了将近5年的监狱生活,住进北京工农兵医院(即同仁医院)就医。不久,他回到家中在亲人的陪伴下休养,为继续投入革命工作积蓄力量。

“批邓联万挂刘”

刘建章1972年底离开秦城监狱后,直到1974年底,所谓的历史问题仍然没有正式结论,组织上也未给他安排工作。心中虽然焦急万分,他也只能“赋闲”在家慢慢等待。

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后,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开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顶住重重压力,坚定地提出“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并将突破口选在铁路系统,着手整顿全国各条战线。

这时,铁道部与交通部重新独立设部,中央决定万里同志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到任后,问起刘建章的情况,杨杰告诉万里:“经过中央审查,建章同志没有问题,可以恢复工作。”万里即向国务院领导做了汇报,不久便恢复了刘建章铁道部副部长职务,协助万里工作。这是刘建章时隔八年多之后,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1975年中央9号文件),刘建章参与了决定

的起草工作。这个文件反映了全国人民厌乱思治、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愿望,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欢迎。从这天开始,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联系实际,分析形势,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全国多数省、区、市也相继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会,传达中央9号文件,铁路整顿工作随即在全国展开,运输生产形势很快好转。在铁路系统的带动下,整顿工作在整个工交战线迅速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这段时间,刘建章配合万里集中精力抓铁路整顿,几个严重堵塞区段先后疏通,全路20个铁路局中有19个完成了装车计划。铁道部提出的“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整顿目标,初步得到实现。

正当铁路整顿工作方兴未艾之际,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中央9号文件是“新老资产阶级在中央后台的支持下搞出来的复辟纲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铁道部顶住干扰,坚持把整顿工作继续推向深入。

11月下旬,政治形势“风云突变”,中央“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下达后,全国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持续进行9个月并且成效显著的整顿工作“戛然而止”。

一些经过整顿形势不断向好的铁路局,资产阶级派性复起,领导班子陷于瘫痪,被调整的派性严重的干部乘机翻案。在铁道部机关,万里、刘建章也受到攻击,无法正常工作。在稍后的一次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上,有人提出“批邓(小平)联万(里)挂刘(建章)”。

1976年3月,全国各条战线揭发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活动进一步深入,铁道部内所谓联系铁路实际“批邓联万挂刘”也在不断升温。小会连着大会,层层进行动员,人人“口诛笔伐”,大字报、大标语在部机关的墙壁上贴了一层又一层,搞得整个铁道部机关“乌烟瘴气”。

“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



1976年8月初，刘建章（戴草帽者）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指挥抢修震毁线路。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铁路运输生产指标也随之全面下滑，刘建章面对这样的形势，内心虽然焦虑，却也无能为力。

正当全国人民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之际，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地区发生罕见的强烈地震，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京山线、通坨线和津蓟线铁路有将近600公里干线和支线受到严重损坏，线路、桥梁下沉移位，钢轨扭曲变形，通信信号设备全部毁坏，有的地方路基塌陷深达3米。唐山、古冶两地区的绝大多数站舍倒塌，伤亡职工占职工总数的40%以上。

大地震发生后，铁道部党组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抢修线路及救灾工作，决定委派多年从事铁路新线建设和具有抗灾抢险实践经验的

刘建章与铁道兵的同志一起赶赴灾区，组成“抢修前线指挥部”，郭维诚任司令员，刘建章任政治委员。但由于当时“四人帮”对铁路整顿工作的攻击越演越烈，造反派对万里、刘建章的围攻也几近疯狂。刘建章担心这种局面会对抗震救灾工作造成干扰。就在此时，余秋里对刘建章说：“你去北京医院告诉万里，让他不要出院，住在北京医院里不会有人去揪他；你呢，去唐山领导抗震救灾，同样没有人敢去灾区揪你。”按照铁道部党组的决定和余秋里的示意，刘建章和郭维诚乘直升飞机了解灾情后，立即着手组织抢修队伍开赴灾区。

到达抢修现场，刘建章利用多年的工作关系，催促各铁路局和工程局尽快派出抢修队伍赶到灾区。自己则戴上草帽，脖子上系条毛巾，冒着酷

暑到基层站、段和职工家中，了解群众受灾情况，对职工、家属进行慰问，鼓励大家振作精神，在党中央领导下，齐心协力重建家园。

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全路系统共组成十多支（16000余人）抢修队伍和1500多人的医疗队投入抢修和抢救工作。短短几天，修复列车39列，组织医疗卫生列车96列、军用列车37列，还将3600余车药械、食品、衣被、建筑材料及其他物资源源不断送进灾区。到8月10日，通坨线、京山双线等陆续恢复通车。作为一名铁道战线老兵，刘建章感到欣慰。

1979年11月28日，中共铁道部党组作出“关于为刘建章同志平反的决定”：“经铁道部党组复查，作出结论，并经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批准：刘建章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白的。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刘建章同志的所谓‘叛徒、特务、托派’的‘罪名’，纯属诬陷迫害。为此，铁道部党组决定，为刘建章同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此时，距刘建章“走出”秦城监狱已有七年之久。在经历了本不该再经历的多年“审查”之后，69岁的刘建章，终于等来了他苦苦等待多时的那一纸结论。对他来说，这虽然有些遗憾，但同时也算“幸事”！因为这时的他，终于彻底卸掉了背负半生的“政治包袱”，可以轻松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余生。■

（上接37页）“我对希周同志品德学问非常佩服，……（他）宣传和执行共产党的持久战和坚持必胜的信心，对我感受很深，受到他革命气概感染，使我后半生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死后风雨有负英烈

陈昭礼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绽放出无限的光辉。

陈昭礼牺牲后，党派人从重庆到桂林，安置烈士的妻子潘超人和儿女。1949年广西解放后，时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张云逸派人到桂林

寻找战友妻子潘超人和家属，护送他们到北京。有关部门将陈昭礼的两个小孩送进干部子弟学校，安排潘超人到全国工商联工作（1964年退休）。

1950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民主党派人士时，特地同潘汉年和梅龚彬提起陈希周：那个叫“小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怎么没看见？1952年4月11日，周恩来致信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指示要把陈希周的遗骨从崇安迁葬福州，在福州修建陈希周烈士墓，供后人瞻仰。

烈士之墓刚修好，1955年就发生了震惊华夏的潘汉年冤案。生前与潘汉年关系密切的陈希周受到牵连，被说成是第三党，或者干脆诬指他消极脱党，从红七军直接去了香港，充当了可耻的叛徒。

1983年，潘汉年冤案正式获平反。1985年8月12日，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文林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陈希周骨灰安放仪式”。1992年，陈昭礼殉难处也建立了纪念碑。这个事迹卓著的名字重新被人们记起。■